

【本刊讯】日本《信使周刊》八月二十七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日共和苏联的可怕蠢动——为垂死的三木政权输氧滴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由于田中角荣这位身居高官显宦的大人物被捕的影响,自民党陷于一片混乱。大平和福田合作,中曾根干事长遭到怀疑,等等,三木体制也已成风前之烛,朝不保夕。尽管如此,三木首相还想通过查明洛克希德事件渡过政局难关。本文试探讨在幕后蠢动的“日共和波利扬斯基合作”这个洛克希德事件以后的重大阴谋)

揭开三木、波利扬斯基、不破“接近说”的内幕之内幕 平河俱乐部的一位负责报道自民党的政治部记者A先生说:“三木面临椎名的政变活动,早已被财界唾弃,现在又遭到大福合作的威胁,而且他的唯一依靠中曾根干事长也弄得满脸‘黑灰’。然而,实际上他还是精神饱满,神气十足的。虽然在田中被捕的当天他作了不愉快的姿态,但是从第二天起就悠然自得了。”什么原因呢?记者A先生自己作了如下的解释:

“原因之一当然在于他掌握着洛克希德事件的美国方面的资料。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确认各在野党没有采取参与‘打倒三木’的行动。只要他清楚地知道在野党方面不拖他的后腿,无论椎名还是大福合作,对三木来说都不是决定性的威胁。而造成这样一种形势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参谋石田博英所使出一招绝技。”

那么,这招绝技是什么呢?最近在一些人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解开这个谜的一个关键。那就是“宫本(日共委员长)、石田会谈”说和“波利扬斯基活动”说。这两者,可以说是一套把戏。评论家Q先生,也是一位奔走于政党派系中间调解争端的知名人物,他说:“据我得到的情报,宫本和石田今年五月到六月间曾秘密地举行过会谈。会谈的题目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似乎就是现在使三木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对于整个政治有什么样的益处?”

评论家村田晃先生就“宫本、石田会谈”一说的背景作了如下分析:“三木派和共产党中间有接触,大概是确实的。我得到的情报说三木派的年轻议员盐谷一夫负责对共产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这与其说是三木派的主动的行动,莫如说是由苏联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之流的建议或工作促成的。如果认为波利扬斯基在双方之间直接进行了调处,那未免有些过份,但总而言之,波利扬斯基处于关键的地位,这难道不是肯定无疑的吗?而三木派、共产党、波利扬斯基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在发生了洛克希德事件以后,日本的政治与其让‘保守本流’的鹰派来执掌,还莫如让三木来搞更好些。”

不破哲三的大胆“口惠”——“日共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唯一护身佛” 日共对于现实政治肯定是有着远远超过正式的或原则的态度的灵活性。这从日共领导人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出来。其中之一就是该党的总书记(党代表大会以后已晋升为代理委员长)不破哲三在“读卖新闻国际经济恳谈会”每月例行的讲演会(二月二十七日)上所发表的演讲。不破总书记作为来宾出席了这次讲演会,并且发表了题为《日本共产党的前进道路》的演讲。他说:“(自民党政府)搞金权政治太过份了,它把历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长远利益的资本主义政府所当然应该担负的任务,甚

日本《信使周刊》文章

《日共和苏联为三木政权输氧滴液》

至实际上也放弃了。”

他在指出自民党政府的“力量不足”之后又说:“可以认为,现在的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所需要的转变,不是直接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型的转变,而正是民主主义型的转变。”

他竟作了如此大胆的发言。这次讲演会是在经团联会馆举行的,这就是说不破总书记在所谓“财界的大本营”挺着胸脯打保票说,共产党一定要取代就连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都不能维护的自民党,而“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实现转变。

宫本委员长六月四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说:“可以预料,自民党在不久的将来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主张查明洛克希德事件,一派反对查明。到那个时候,肯定要和从自民党分出来的主张查明洛克希德事件的一派共同组成看守内阁。”

把这番话和不破总书记的上述“宣传”联系起来看,不是可以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的灵活性已“超出表面的东西”吗?

新左翼系统的评论家饭田桃认为:“这条路线显然和‘廉洁的三木’、新自由俱乐部的路线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说,想在国会的红地毯上取得胜利的日共,为了胜利也想利用三木。”

在日共主导下粉碎保守本流三木势力,是波利扬斯基的战略吗?村田晃先生指出:“三木政权和日共在现实政治上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状况,也就是流传着‘宫本、石田会谈’的情报那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正是苏联所追求的目

标。”村田晃说:“对于实现了悬而未决的欧洲集体安全,已能专心致力于亚洲集体安全”的苏联来说,洛克希德事件(给日美安全体制出了丑)所引起的日本

政局的演变,正是卷土重来的极好机会。自民党的亲中国势力倒退了,正如经团联会长土光访苏所表现的那样,财界主流也再次把目光转向苏联。同日共的关系去年以来也逐渐好转。因此,同日共宫本路线再次接近,以恢复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可以说这就是波利扬斯基的战略。”

很多人认为,原来任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前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任驻日大使,完全是“降职”。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动向分析部主任真田助岩却说:“应该看到,苏联把一位大人物派到日本来还是有其与此相适应的重大目的。波利扬斯基自从四月到日本上任以来,就竭尽其全力搞政治活动。苏联的重大目的,就是想利用现在日本的政治状况,使日本的下届政权倾向于苏联。具体地说来,就是对于保守派方面设法使三木政权继续存在下去,而对于革新派方面则靠紧日共宫本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来说没有必要使日本成立单独的保守政权或者单独的革新政权,即使成立‘保革联合’也毫无妨碍。因此,便对三木政权和宫本路线同时进行工作。”

一直研究波利扬斯基的工作动态的某新闻记者推测说:“另一方面,波利扬斯基到宫本委员长那里去作礼节性拜访,以这种方式加深同革新派方面的接触,同时又秘密地邀请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双方所欢迎的、‘革新的调解人’岩井章(总评前事务局长)到苏联大使馆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

“我想波利扬斯基的这种幕后活动在不久的将来会很清楚地反映到日本政局的动向中去。”

时事社报道 《三木和大平会谈破裂》

《福田表示决心使三木下台,说要以新体制迎接大选》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十三日电】题:三木和大平会谈破裂

三木首相二十三日下午在首相官邸同大平藏相举行会谈,围绕当前政局问题交换了意见,历时二时十五分。会谈时,首相强调了如下三点:(一)早日召开国会临时会议;(二)继续查明洛克希德问题;(三)与此同时,要不断与福田副总理和大平藏相举行会谈。首相还要求藏相予以合作。但是藏相鉴于认为以现体制不能渡过国会临时会议,强调有必要在召开国会临时会议之前实现人心一新,于是会谈以破裂而告终。

这次的“三木大平会谈”是继三木和福田会谈之后举行的。首相提出召开国会临时会议

与政局问题分别处理的方案,间接地表明在国会临时会议上不解散众议院的意向,以此呼吁继续举行三木、大平、福田会谈。

对此,大平藏相强调,财政特例法等遗留下来的立法案的处理问题是应迅速解决的“重要国务”。同时他还说:“尽管这些悬案的处理是暂时的,但政府是不能处理的。不通过国会不能解决。因此,当前的课题是,首相谈论大选前,要考虑现内阁能否赢得大选。”

这番话表明,他认为依靠三木体制不能渡过国会临时会议,他对首相相对政局的态度只是“听了听”而已。这次会谈的结果,更明确了三木首相与大平藏相之间对时局的认识存在着

不可弥补的差距。大平藏相在会谈后会见记者时说:“关于今后的行动,将同福田副总理和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的‘人们商量’。这表明他将以坚定的决心对待在国会临时会议之前实现人心一新的问题。”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十三日电】题:福田副总理表示决心使“三木下台”,说要以强有力的新体制迎接大选

自民党福田派(八日会)二十三日上午在都内一家饭店召开紧急全体会议,为迫使“三木下台”——政权更迭而加强了团结。福田副总理首先发表了谈话。他强调:“自民党只有以洛克希德事件为转机,建立强有力的新体制迎接大选,否则不能在大选中赢得胜利。我

决心本着这种想法,处理局面。”他表示决心说,应该在解散国会进行大选之前,实现三木首相下台,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迎接大选。福田副总理的态度是:如果取得首相作出下台的明确保证,就让三木首相召集国会临时会议,处理财政特例法案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我要给予合作。在处理完悬而未决的问题之后,解散国会之前,实现三木首相下台。要以这种方针来引导政局发展。

福田表明了他的政见:在解散国会和大选前实现“三木下台”,更迭政权,在新政权下迎接大选。副总理还表明了以重大决心来改变政局的想法。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十三日电】自民党船田派二十三日下午于都内平河町事务所召开大会,商定要严格遵循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要求“三木下台”的方针。

【本刊讯】日本《军事研究》八月号刊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国际部增田纯男的一篇题为《苦恼的苏联》的文章，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苏联在拼命追赶美国，但是，能否克服其内部存在的弱点？）

超级强国苏联一再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出口武器，加强商船船队和渔船船队，并试图逐一超过美国，称霸世界。但是，剥开画皮一看，苏联则由于农业危机、重工业和轻工业失调、技术革新落后、经营管理无能等各种原因，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于是在三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追究农业政策失败的责任，波利扬斯基被免去了农业部长的职务；在新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摘下了一度挂起的优先发展消费物资的招牌，提出了用重新发展重工业和振兴农业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由“量的发展”到“质的发展”的变化和提高效率。

但是，苏联要推行这种政策就需要同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交流和技术交流，就需要执行缓和紧张局势的外交路线。然而，苏联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是受到西方各国的怀疑的。尽管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亲自提出了新的和平纲领，争取实现裁军，建立亚洲安全体制，签订不使用武力条约，缔结美苏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并没有进展。

这些计划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对苏联增强军事力量有戒心，对苏联国内实行思想控制不满。现在，苏联就安哥拉问题强调说：“缓和紧张和民族解放斗争是并行不悖的”。正如这种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苏联对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国内外的反社会制度的活动，仍然采取严厉的态度。这种态度究竟能否使苏联所必需的同西方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取得进展，值得怀疑。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苏联共产党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内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国外，同其他共产党的步调不一致，特别是传说要取得政权的西欧共产党摆脱苏联和批评苏联的政治体制。可以说这提出了同意识形态有关的重大问题。

因此，让我们在谈谈苏联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来看看苏联的现状。

军备和援助的重担 虽说苏联经济停顿起由于农业萧条、重工业和轻工业失调、技术革新落后，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经济本身肩负着庞大的国防费用和对外援助的重担。因此可以说，苏联经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满足国民希望过富裕的消费生活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看看苏联的军事预算吧。据说，从一九六二古巴危机以来，每年增长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现在的军事费用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而美国的军费则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四。一九七四年，苏联的国防费为九百三十亿美元，而美国的国防费为七百七十九亿美元，双方相差很大。因此，美国的戒心越来越大，对苏联越来越不信任。美国认为，用不了多久，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军备均势就会崩溃，苏联就会居于优势。正如福特总统说要采取“以实力维持和平”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形势将要求美国一面维持缓和，一面增强国防。这将再次加剧美苏的扩军竞赛。这也是苏联感到头痛的问题。

另外，苏联为了向世界各地渗透，施加影响，正在提供庞大的军事援助。据美国国防部安全援助局局长布什不久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苏联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向第三世界的三十八个国家，以非常有利的条件提供了价值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另一方面，苏联现在同包括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的四十五个国家在内的世界六十五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一九七二年，苏联通过援助出口的机械、设备、资材的金额达九亿卢布。同一年苏联还通过援助方式在各国建立

日《军事研究》文章《苦恼的苏联》

说苏联一再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出口武器，加强商船船队，试图超过美国，称霸世界。但由于苏联农业危机、重工业和轻工业失调、技术落后等各种原因，使苏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了五百二十个工厂。苏联同先进国家在积极地进行援助竞赛。

这种军备和援助的沉重压力对苏联经济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

赤字达二十七亿之多 西方先进国家为了避免它们在石油危机后发生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因此出现的经济危机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种危机当然也对进口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苏联，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是说，苏联在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同时，也被迫进口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目前发表的苏联一九七五年的贸易收支的赤字达二十七亿卢布之多。前一年盈余二十亿卢布，因此这样剧减是创纪录的。

克里姆林宫迄今一直设法减少赤字，去年把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的原油价格从一桶三美元提高到八点一美元，一举提价二倍；另外还传说卖掉了价值十亿美元的黄金。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发生效果。

苏联既然不能制止经济方面已经开始的缓和，那末今后如何消除随着扩大经济交流而继续增加的贸易赤字，就是重要的课题。

但是，长期薄弱的环节还是谷物生产。农业萧条，正象人们所说的是“苏联的致命弱点”那样，它是苏联最苦恼的问题。

苏联的弱点是“农业” 苏联迄今用庞大的农业投资来推行重农政策，但是，至今生产率依然很低，而受天气的影响很大，生产不稳定，每年要花费大约三十亿美元的宝贵外汇从外国购买谷物。这就是苏联的现状。

在五十年代即赫鲁晓夫时代，采取了开垦处女地、改进征购制度等对农民进行物质刺激的政策。一九六五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进行了巨额的投资，提出“农业不要由天气支配，而要由科学和人支配”的目标，并把重点放在改良土壤、实行机械化和化肥化，开始执行长期计划。

农业投资逐年增加，包括非生产部门在内，赫鲁晓夫时代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六一——六五年）投资六百五十八亿卢布，而第九个五年计划（七一年——七五年）则投资一千七百一十七亿卢布，其数量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但是，由于天气不好，苏联的农业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购买缺粮的数量是巨大的。苏联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由于农业歉收而购买了二千八百万吨谷物。

吃肉不如吃鱼 苏联第十个五年计划，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控制大量消费谷物的畜类的生产。

现在看一下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畜类的增产情况吧！牛肉，猪肉、嫩鸡等肉食增长百分之六至十（上一个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牛奶增长百分之七至十（上一个计划增长百分之九，大上一个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四），鸡蛋增长百分之十四至十七（上一个计划增长百分之四十四）。这些计划数字大幅度下降了。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口估计最少增长百分之五，因此平均每个人的食肉量，实质上没有增加。点缀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大幅度增加供应畜产物”的目标，在这次计划中大大后退了，苏联消费者将被迫再次过勒紧裤带的生活。

现在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是大力宣传“吃肉不如吃鱼”。逐年大幅度增产的苏联的渔获量，在这次计划中争取增产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二。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水产用于家禽饲料，而且这样就可不必象购买谷物那样花费巨额的金钱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只要向大海大洋派出船只，就可以轻易地获得水产。

最近，莫斯科和索契等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专门卖鱼的超级市场“海洋”。这也是应付经常缺肉的一种措施，效仿日本人吃鱼，以补充国民需要的蛋白来源。

莫斯科的所有饭店和食堂，每逢星期四就贴出广告说：“鱼，味道鲜美，有利健康！今天的菜谱全是鱼制品”。长期习惯吃肉的市民，绝大多数还是喜欢吃肉

而不喜欢吃鱼。据说，这些日子在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曾经零星地发生造船工人罢工事件，在罗斯托夫和基辅也发生过抗议商品缺乏，损坏市场部分店铺和商品的事件。苏联当局希望这种国民的不满不要指向“无肉日——食鱼日”。

争取提高效率和质量 勃列日涅夫政权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下决心积极地引进西方技术和资金。为此，要始终维持现在的经济体制，同时要设法利用外部的刺激来重建经济。

但是，如果大幅度地改变经济体制，就会对党的体制、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影响，使之出现资本主义和自由化的现象，并且会有导致动摇政权基础的危险。因此，勃列日涅夫政权推行经济政策时是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的。

另外，在一党专政持续了几十年，以党的官僚为中心的秀才们掌握一切特权的现状下，是反对进行威胁这种特权的改革的，这将助长不变更现行基本路线的保守性。

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将其成就迅速地运用于经济活动中，然而，苏联的一般产业中缺乏接受现代技术的人员和物质基础，这是最大的弱点。分散的行政是阻碍提高效率的原因。

二十四次党代会上曾提出优先生产消费物资，争取国民生活取得飞跃发展。但是，二十五次党代会却再次决定优先发展工农业，这使国民的美梦破灭了。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物资再次出现奇缺，而且不提高质量，那末国民的失望就会更大。

对外政策困难重重 不能不说，围绕苏联的国际形势是很严峻的。

首先，由于美苏搞缓和的影响，西欧共产党向苏联正统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另外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和萧条使苏联的鹰派理论家集团增强了力量，这会起到牵制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外交的作用。关于美苏缓和，对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增强和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等，美国国会极为警惕，这将影响美国的对苏外交。而苏联最头痛的是，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长女的法国共产党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且，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现在也要追随法国共产党采取行动。

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是强调统一和团结，就越是会被其他国家的友党认为是控制和强加于人，结果就会招致分裂和反对，同中国，坚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东欧，自由化的速度在加速；在西方，现在受到增强了力量的共产党的挑战。在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怎样理解和对待这些友党的独立自主路线——这是苏联所面临的课题。

在外交方面，据料苏联会在这三个主要方面下功夫：（一）美苏协调；（二）在欧洲推行缓和外交；（三）积极介入亚洲。

虽说美苏间的缓和活动出现了阴影，但是，美苏协调的基本路线并未改变。苏联强调由美苏超级大国来维持世界和平，试图使第二次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在欧洲，为了在全欧安全保障首脑会议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搞缓和，而要通过同西欧扩大经济关系，以谋求重建本国经济。另外，据料苏联今后将利用实现了全欧安全保障的势头，把矛头指向亚洲，寄大希望于越南，同时谋求同亚洲各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实现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其中，同亚洲的大国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保持着对立，但是，在经济方面则引进日本的技术和资金，以求克服本国的经济萧条。总之，苏联对日本是采取主动接近的态度的。

苏联革命已经六十年了，它已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它想在军事力量等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国内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所以说它要想实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梦，还是遥远的。

美新处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谈板门店事件

《美国认为北朝鲜声明是“积极步骤”》

【美新处华盛顿八月二十三日电】题：美国认为北朝鲜的声明是“积极步骤”

国务院认为，北朝鲜对打死两个美国军官的事件表示遗憾的声明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它说，美国坚持要北朝鲜对我们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人员的今后的安全”作出保证。

国务院发言人芬塞思八月二十三日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说，华盛顿已经要求八月二十四日在板门店召开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以便让北朝鲜人作出这种保证。

在国务院例行的每日记者招待会上，芬塞

思说，他想对八月十八日杀害两名美国人和八月二十一日北朝鲜主席金日成的表示遗憾的口信发表三点意见。

1、“我们注意到了北朝鲜的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2、“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即两名美国军官无端地被残酷打死。”

3、“因此，我们要求军事停战委员会明天举行会议，坚持要北朝鲜对我们在非军事区的人员的安全作出保证。”

几名记者对发言人说，看来，他目前关于

这一事件的讲话比国务院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关于金主席的口信的说法的调子低多了。

芬塞思回答说：“我们昨天的确说过，声明是北朝鲜人间接承认他们采取这一残暴行动是错误的，我今天进一步把它说成是一个积极步骤，就它所走的路子而言，是个积极步骤。”

他对提问者说，自美国和北朝鲜的各级代表八月二十一日在板门店开会以来，北朝鲜人没有再发表看法，也没有举行新的秘密会议。

芬塞思拒绝“猜测”，如果北朝鲜人拒绝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话，美国将作何选择。

记者问如果华盛顿得到了北朝鲜的保证，它是否认为事件就结束了，芬塞思只是说，“这当然会改善目前的气氛”。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驻南朝鲜的部队仍然处于所谓的三级防务状态，比通常的准备状态所需要的高一级。

但是他说，国务院

八月十八日下午为处理这一事件建立起来的特别小组已于八月二十二日解散。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二十三日电】芬塞思在同基辛格国务卿磋商后会见记者们的时候说，美国在明天举行的停战委员会会议上将坚持这一立场：当“我们的人员”在把北朝鲜和南朝鲜分开的非军事区活动的时候“不得被伤害”。

这位发言人澄清基辛格上周提出的要北朝鲜人“赔偿”的要求说，基辛格考虑的是平壤的保证而不是对被打死军官的家属进行赔偿。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二十三日电】美国政府昨天曾说，美国认为，北朝鲜关于板门店事件的口信是“不能接受的”，但今天认为，北朝鲜对美国的两名军官被北朝鲜士兵杀死的事件发表声明表示遗憾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同时要求明天在板门店举行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坚持要北朝鲜对非军事区我方人员的安全作出保证”。

人们认为，美国对北朝鲜口信的态度明显改变表明美国努力使两名美国军官被杀造成的美国和北朝鲜的争执宣告结束。

【美联社曼谷八月二十二日电】泰国陆军元帅巴博·乍鲁沙于今天飞回台湾过流亡生活，同时，政府领导人要求人们保持平静，学生们也结束了数天来大规模的、有时是流血的示威。

国防部长他维·社尼翁对记者说，巴博只是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来，“他回来并没有什么阴谋”。

他维说，“他的离开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又说，巴博显然是由于昨天爆发了反对他的示威而赶紧离开泰国的，在那次示威中，有两名学生被打死，约四十名学生被打伤。

他维说，看来，学生对于社尼·巴莫总理政府的威胁也和六十五岁的巴博的威胁一样。据传巴博目前视力衰退，心脏也有毛病。

他说，“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学生不散开，那就意味着他们要推翻政府。”

与此同时，泰国全国学生中心秘书长索探·森巴吞说，这个学生组织向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

泰国全国学生中心要求社尼政府对巴博和另外两个被赶下台的领导人他依·吉滴卡宗和他的儿子纳隆·吉滴卡宗（他们两人都流亡在国外）进行调查。它还要求政府对帮助巴博于八月十五日秘密潜入泰国的人予以逮捕，并要求对袭击泰国全国学生中心星期六的集会的右翼分子采取行动。

《曼谷邮报》社论《是迅速考虑的时候了》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八月二十日发表题为《是迅速考虑的时候了》的社论说：

正如许多议员所指出的，巴博呆在国内一事可能会被左派或右派组织用来制造骚乱。左派分子会找到一条理由来努力使公众支持他们，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还有人表示担心，军方可能利用巴博将军问题来纠集希望以强有力的政府取代软弱政府的各种势力。

看来许多政界人物怀疑巴博的确是由于健康状况才回国，还是旨在重新夺取政权。他们不能肯定军方会忠于民主党政府。结果，在这位将军呆在泰国的问题上人们的感情就很冲动了。

砍树的一个办法是向这棵树投下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然而在当时，特别行动小组决定只建议使驻南朝鲜美军处于戒备状态并加强在那个地区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

第二天上午，参谋长联席会议把驻朝鲜美军的戒备状态提高到三级防御状态（最低级是五级防御，一级防御是作战状态）。接着基辛格对特别行动小组说，总统已经决定增派军用飞机和海军舰只到南朝鲜。轰炸白杨树的主张被放弃了，因为这会使美国首先采取战争般的行动。相反，福特总统亲自决定，一批美国兵将进入板门店共同警备区，把树砍倒。不开枪——除非反复无常的北朝鲜人开始做某些事情。

抗议：弗鲁登海军少将指责北方就在四小时之后，韩将军要求同弗鲁登海军少将举行秘密会晤。这两名军官各在一名助手和一名译员的陪同之下谈了十三分钟。韩的语气是温和的和和解的；他实际上承认，杀死博尼法斯和巴雷特是一个错误，并且说，这场殴斗是一个意外事件。美方代表认为他说这些话是北朝鲜设法使局势缓和下来并以同样态度回答。

但是此事不一定就此了结。在过去二十三年中，平壤一再向美国和南朝鲜挑战，找岔子的边境事件一个接一个，对在南朝鲜的四万二千名美军来说，白杨树事件只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中的一小冲突。

美刊关于美在板门店进行军事挑衅的报道

《白杨树之战》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三十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白杨树之战》，摘要如下：

（此文由米尔顿·本杰明同驻在板门店的霍尔格·詹森及在华盛顿的劳埃德·诺曼一起合写）

天方破晓，军队便出动了。当F—4鬼怪式飞机和F—111战斗轰炸机在上空盘旋的时候，一批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三十名全副武装的美军组成的巡逻队越过了朝鲜非军事区，并进入了板门店的停战村。在东面，三架巨大的B—52轰炸机沿着非军事区的南端飞行，撒下了金属反射体以使北朝鲜的雷达辨不出方向。离板门店一英里远的地方，一支由三百名美国和南朝鲜士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这些人脸被烟灰弄得黑黑的、穿着防弹上衣、手里拿着自动武器——紧张地等待着。当这支美国巡逻队包围它的目标——一棵四十英尺高的诺曼底白杨树——时，二十六架武装直升飞机在这支美国巡逻队的上空保护性地盘旋。这些士兵们用一个链锯迅速锯倒了这棵树，然后，作为额外收获，又砍倒了附近的另外两棵树。他们的象征性的惩罚使命完成了，这支巡逻队未放一枪地撤回来了。

这一行动在美国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动，但是，这是一九六八年“普韦布洛号”事件以来分裂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发展到最高点的一

周中的高潮。在本周早些时候，北朝鲜人用斧子野蛮地杀死了两名陆军军官，当时，他们正护卫一个南朝鲜的工作小组修剪这棵白杨树。三天后，美国人砍倒了这棵树。由于非军事区两边有一百多万军队都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国务卿基辛格缩小了这一报复行动，命令美国只限于用一句温和的话宣布这一任务。在公开场合，共产党人指责华盛顿进行了一次严重“挑衅”和“制造一种恐怖的战争气氛”。但是，与此同时，《新闻周刊》获悉，北朝鲜人要求在板门店同美国高级代表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而且几乎承认，他们引起这场风波是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挥刀舞剑的时候，残酷杀害两名美国军官的时候，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全神贯注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紧张斗争的时候。福特总统发表一项声明指责北朝鲜进行“谋害”，而且警告说，“由此产生的后果”将全部由北朝鲜承担责任。美国还派出几个中队的F—4飞机和F—111飞机前往南朝鲜，并下令以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为首的海军特混舰队驶往朝鲜水域。但是，福特在这

次袭击发生后四十八小时发表的受名演说中没有提到朝鲜事件。

世界上的共产党超级大国中国和苏联似乎也迫切希望这一事件平息下来。但是，两个朝鲜则处于过度紧张状态，北朝鲜人整整一个星期来似乎是在摩拳擦掌——虽然不是要同美国摊牌。

发生谋杀事件后一小时，华盛顿收到了关于这件事的消息。首都许多处理危机问题的高级人员都不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一位值勤官员把这些消息转给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克罗斯福特，他当时便把这些消息告诉福特总统。总统然后用电话同还在华盛顿的基辛格交谈。

象征性的姿态 第二天下午，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和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政府应付危机的高级小组）的小型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北朝鲜人的袭击似乎是预谋的。共产党人的动机仍然不明，但是布什说，没有证据证明要以武力向非军事区推进。这个小组考虑了各式各样的抉择，其中包括在北朝鲜港口布雷。但是很快就一致认为，需要作出较富有象征性的姿态：砍倒那棵白杨树。有人建议，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赵浩生在纽约“关怀震区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战天灾，除人祸》，摘要如下：

今天纽约区的中国人因为关怀中国冀东地区的地震，大家自动的到这里聚会，这个聚会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向受灾人民表达我们的慰问，第二是向抗震救灾的英雄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意，第三是揭穿少数幸灾乐祸的民族败类企图趁火打劫的阴谋。

当我们听到冀东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时，我们对灾区生命财产的损失感到关怀，但绝没有悲观绝望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对新中国有正确了解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二十多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人祸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历经天灾战无不胜，并且以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主动的向大自然挑战，为害千万年的黄河，飞沙走石的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世界最高峰，都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征服了。中国人民更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击败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应付这次冀东地震是绰有余裕的。

我们读到许多自灾区撤退出来的外国记者、外宾的报道，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英勇、镇定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一个不表示由衷的敬佩。

从地震的消息传到美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从电视上看到从容移住到室外的北京居民，十三陵水库上广大强壮的抢修队伍，护士怀抱中的新生婴儿，堆积如山的救济物资和慰问团与受灾群众的亲情相聚……。这使我们想起旧中国每逢灾害饿殍遍野，一片废墟的悲惨景象，如此新旧对比，面对着电视上的动人画面，使我们激动得禁不住的热泪滚滚。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英雄气概感到骄傲呢！

但是想不到逃到台湾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竟把这次震灾当作天赐良机，大搞其幸灾乐祸的反共宣传和趁火打劫的敛财活动，这实在是卑鄙无耻之极。

蒋政权统治大陆期间，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因而有“中华官国”之称。加上十年九荒，灾患频仍，又被叫作“中华灾国”，如此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以我的老家河南为例，就有水、旱、黄、汤（恩伯），外加蝗虫和各种瘟疫年年为害，就水灾说吧，蒋政权年年嚷着治黄、导淮，可是我们住在黄河淮河边上的，却没有一年不遭水灾。我在开封读书的时候，黄河发水，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准备好飞机逃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竟秘密派兵到河南掘堤，企图水淹河南，保住他山东的地盘。蒋介石的“气魄”更大，抗战期间，他竟下令炸决黄河花园口阻挡日军，结果日军没挡住，华北数省都被黄水淹没，千百万同胞惨遭溺死。

蒋政权的官员还有一个普遍的特性，就是见灾心喜。正象他们擅于发“国难财”“接收财”一样，他们也擅于利用灾害发“赈济财”。一有灾荒，他们不管灾民死活，先搞募捐运动、义务戏、赈灾捐、救济税，名目繁多，最后都进入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的私囊。这和华国锋总理带领的慰问团与灾民亲人般打成一片的动人情况，真是两个世界。

更可耻的是，蒋政权擅于利用灾害向外国——特别是美国乞讨，甚至不惜工本和外国广告商签下合同，把灾情、灾民和灾区惨不忍睹的新闻、照片以最乞怜哀告的文字写出发表，象“一块钱，一条命！”的口号，把中国人命形容得贱如草芥。这种年复一年的宣传，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个个都是乞丐、难民，外国人因而又给蒋政权加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中华丐国”。这种叫街似的自虐宣传，引起外国人的施舍，出卖民族自尊的蒋帮官员就本利兼收大发洋财。

蒋帮除了擅于向外国乞讨外，华侨也一向是

赵浩生在纽约“关怀震区大会”上演讲

《战天灾，除人祸》

他们借灾敛财的对象。他们平时对孤悬海外的华侨不闻不问，一要捐钱就想起华侨。华侨虽然求生不易，但为救国捐钱总是有求必应，蒋帮就利用这种乡土之情百般敛财，于是救国、救灾、祝寿、献机、公债、奖券……花样无穷。如此沿袭下来，捐钱救国就成了华侨的一种传统。这次冀东地震，华侨闻讯立即自动要求捐款，但发现祖国的政策是自力更生，对大家的好意心领婉谢，许多华侨不免感到若有所失。

但是倘若我们冷静的想想，就会发现华侨捐钱救国的传统思想虽然没有变，但是我们的祖国可变了！今天的祖国，是只令我们爱，而不需要我们救了。今天的祖国繁荣强大，给华侨带来的是荣誉和自尊，不再使华侨感到羞辱难堪，不再把华侨当作政治本钱和摇钱树了。这，不正是华侨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祖国吗？！蒋帮的反共传说拒绝外援是违反中国“传统”，这是他们乞讨成性的传统，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的传统，我们要打破这个无耻的传统，作一个可以挺起腰杆子的中国人！

蒋帮宣传中最荒唐的一点就是说这次地震是“天意”，这实在要让人笑掉大牙。任何人都

美《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书评

《投降并发症 探索基辛格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十六日在《每周一书》的栏目中刊登沃尔特·克雷斯的一篇书评，题为《投降并发症》，《探索基辛格的政策》，摘要如下：

在苏联的独裁政权同美国的关系中，随着基辛格这位卓越的和平战士的出现曾有过一段欢快的时期，但是在使人清醒的现实的光芒之中，已经早已烟消云散了。

至今仍然容易上当受骗的美国公众的很大一部份，已开始认识到在同苏联独裁政权打交道时不可能和平共处。

许多长期闭眼不看现实的追求和平的人已经痛苦地看清楚，即美国决不能再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声称相信，在实现任何目标方面都可以得到苏联的充分合作，而不会使世界变得软弱和平安得为苏联共产党所征服。

正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伏击》一书的作者那么敏锐地指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杜鲁门在波茨坦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和巴黎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肯尼迪在维也纳进行了试验，产生了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尼克

松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收获是灾难性的缓和与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背叛；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首脑会议上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是隐藏着轻蔑和卑鄙的圈套的伪善欢迎。

鉴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美国在二百周年纪念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技术方面或者甚至是资金方面的危机，而是领导方面的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福特总统是一个被手下人牵着鼻子走的国家首脑，因而致力于继续行使美国“在战略上下降到劣势地位和使美国搞缓和的政策。”

作者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任何总统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坚决认为，这些错误至少是他个人的错误。”

施拉弗利小姐以在她的其它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同样严厉的言词谴责基辛格患有一种“投降并发症”。

她写道：

“只要我们有一个驾驭着制定美国总战略的易于投降的失败主义者，当然我们就不可能重建对我国的生存极为重要的战略威慑力量。”

她又说：“要是他能够继续用欺骗的办法

以说明他们自觉“气数”已尽，只有“天”可以救他们了。

冀东地震发生后，蒋帮在各方面都充分显示出其幸灾乐祸的心情。幸灾乐祸本身，就是一种最无耻最没有出息的表现；但蒋帮的心情并不只此，更重要的是，蒋帮感到，他们唯一的靠山美国的风声不好了，他们已经看出，今天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中美邦交的正常化势在必行。这形势使他们心惊胆怕，昼夜不安，忽然听到冀东地震，就如天降良机立刻大肆渲染，借此压惊壮胆。

今天蒋帮的处境是：对外，不论他们如何摇尾乞怜，美国要和中国建交，非要抛弃蒋帮不可；对内，不论蒋帮特务如何镇压控制，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伟大英雄的中国人民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冀东的地震算不了什么，逃到台湾去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更不堪一击。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同胞会满怀亲情伸出他们的双臂，迎接自己的骨肉兄弟到大陆上去，尽情的周游壮丽强大的祖国，参观更繁荣更美好的冀东地区。

——*+*+*——

最后通牒面前投降的军事劣势地位，那么这种背叛出卖行为不光危及我们的自由、生命和命运。西方的文明将被毁灭，世界各地的自由和宗教也将被毁灭。

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向全国全面披露，国会应当进行一次不受挑战的客观调查。回答基辛格是否说过这种有投降思想的话对我国的生存来说是很重要的。两位作者认为，这件事在报纸上刊登的标题应比水门事件大，占的版面应比水门事件多得多。

书中说，“尽管水门事件威胁到我们曾经是神圣的荣誉，但是它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独立。”

书中有力地指出了这样一点，即不论是基辛格是否像指责的那样说过这些话，还是说过差不多的话，在过去八年中，美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丧失了战略力量是一个既成事实。

他们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基辛格这样做会不会是故意的。”

两位作者说，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报纸上刊登的二十几篇文章证实了基辛格的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并证明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他同基辛格的谈话的内容大概是可靠的。最有权威的一篇文章是基辛格在华盛顿的最亲密的朋友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

使总统和人民相信，我们并不需要新的战略力量，而且即使我们去生产这种力量也不可能及时得到，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希望生存下去。”

为了证实对基辛格的“投降并发症”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她引用了最近退役的海军作战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基辛格在一九七〇年对他说过

的话。朱姆沃尔特在他写的《在岗位上》这本书中，透露了他对同国务卿进行过的一些机密谈话的追述。

据说，基辛格曾经说过：“美国的全盛时期过去了，今天是苏联的全盛时期。我作为国务卿的任务是通过谈判争取到现在可以达到的、最容易被接受的二等级地位。”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人民确实需要知道，对基辛格的这种指责是否确凿，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这种指责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有公开免除对他的这种指责的权利，即他故意使美国从具有压倒优势力量的地位下降到濒临于战略上投降的边缘。

但是，如果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即基辛格过去一直而且现在继续故意通过秘密谈判，取得一种会使美国在苏联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赵浩生在纽约“关怀震区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战天灾，除人祸》，摘要如下：

今天纽约区的中国人因为关怀中国冀东地区的地震，大家自动的到这里聚会，这个聚会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向受灾人民表达我们的慰问，第二是向抗震救灾的英雄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意，第三是揭穿少数幸灾乐祸的民族败类企图趁火打劫的阴谋。

当我们听到冀东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时，我们对灾区生命财产的损失感到关怀，但绝没有悲观绝望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对新中国有正确了解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二十多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人祸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历经天灾战无不胜，并且以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主动的向大自然挑战，为害千万年的黄河，飞沙走石的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世界最高峰，都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征服了。中国人民更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击败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应付这次冀东地震是绰有余裕的。

我们读到许多自灾区撤退出来的外国记者、外宾的报道，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英勇、镇定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一个不表示由衷的敬佩。

从地震的消息传到美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从电视上看到从容移住到室外的北京居民，十三陵水库上广大强壮的抢修队伍，护士怀抱中的新生婴儿，堆积如山的救济物资和慰问团与受灾群众的亲情相聚……。这使我们想起旧中国每逢灾害饿殍遍野，一片废墟的悲惨景象，如此新旧对比，面对着电视上的动人画面，使我们激动得禁不住的热泪滚滚。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英雄气概感到骄傲呢！

但是想不到逃到台湾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竟把这次震灾当作天赐良机，大搞其幸灾乐祸的反共宣传和趁火打劫的敛财活动，这实在是卑鄙无耻之极。

蒋政权统治大陆期间，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因而有“中华官国”之称。加上十年九荒，灾患频仍，又被叫作“中华灾国”，如此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以我的老家河南为例，就有水、旱、黄、汤（恩伯），外加蝗虫和各种瘟疫年年为害，就水灾说吧，蒋政权年年嚷着治黄、导淮，可是我们住在黄河淮河边上的，却没有一年不遭水灾。我在开封读书的时候，黄河发水，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准备好飞机逃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竟秘密派兵到河南掘堤，企图水淹河南，保住他山东的地盘。蒋介石的“气魄”更大，抗战期间，他竟下令炸决黄河花园口阻挡日军，结果日军没挡住，华北数省都被黄水淹没，千百万同胞惨遭溺死。

蒋政权的官员还有一个普遍的特性，就是见灾心喜。正象他们擅于发“国难财”“接收财”一样，他们也擅于利用灾害发“赈济财”。一有灾荒，他们不管灾民死活，先搞募捐运动、义务戏、赈灾捐、救济税，名目繁多，最后都进入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的私囊。这和华国锋总理带领的慰问团与灾民亲人般打成一片的动人情况，真是两个世界。

更可耻的是，蒋政权擅于利用灾害向外国——特别是美国乞讨，甚至不惜工本和外国广告商签下合同，把灾情、灾民和灾区惨不忍睹的新闻、照片以最乞怜哀告的文字写出发表，象“一块钱，一条命！”的口号，把中国人命形容得贱如草芥。这种年复一年的宣传，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个个都是乞丐、难民，外国人因而又给蒋政权加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中华丐国”。这种叫街似的自虐宣传，引起外国人的施舍，出卖民族自尊的蒋帮官员就本利兼收大发洋财。

蒋帮除了擅于向外国乞讨外，华侨也一向是

赵浩生在纽约“关怀震区大会”上演讲

《战天灾，除人祸》

他们借灾敛财的对象。他们平时对孤悬海外的华侨不闻不问，一要捐钱就想起华侨。华侨虽然求生不易，但为救国捐钱总是有求必应，蒋帮就利用这种乡土之情百般敛财，于是救国、救灾、祝寿、献机、公债、奖券……花样无穷。如此沿袭下来，捐钱救国就成了华侨的一种传统。这次冀东地震，华侨闻讯立即自动要求捐款，却发现祖国的政策是自力更生，对大家的好意心领婉谢，许多华侨不免感到若有所失。

但是倘若我们冷静的想想，就会发现华侨捐钱救国的传统思想虽然没有变，但是我们的祖国可变了！今天的祖国，是只令我们爱，而不需要我们救了。今天的祖国繁荣强大，给华侨带来的是荣誉和自尊，不再使华侨感到羞辱难堪，不再把华侨当作政治本钱和摇钱树了。这，不正是华侨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祖国吗？！蒋帮的反共传说拒绝外援是违反中国“传统”，这是他们乞讨成性的传统，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的传统，我们要打破这个无耻的传统，作一个可以挺起腰杆子的中国人！

蒋帮宣传中最荒唐的一点就是说这次地震是“天意”，这实在要让人笑掉大牙。任何人都

美《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书评

《投降并发症 探索基辛格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十六日在《每周一书》的栏目中刊登沃尔特·克雷斯的一篇书评，题为《投降并发症》，《探索基辛格的政策》，摘要如下：

在苏联的独裁政权同美国的关系中，随着基辛格这位卓越的和平战士的出现曾有过一段欢快的时期，但是在使人清醒的现实的光芒之中，已经早已烟消云散了。

至今仍然容易上当受骗的美国公众的很大一部份，已开始认识到在同苏联独裁政权打交道时不可能和平共处。

许多长期闭眼不看现实的追求和平的人已经痛苦地看清楚，即美国决不能再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声称相信，在实现任何目标方面都可以得到苏联的充分合作，而不会使世界变得软弱和平安得为苏联共产党所征服。

正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伏击》一书的作者那么敏锐地指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杜鲁门在波茨坦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和巴黎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肯尼迪在维也纳进行了试验，产生了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尼克

松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收获是灾难性的缓和与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背叛；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首脑会议上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是隐藏着轻蔑和卑鄙的圈套的伪善欢迎。

鉴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美国在二百周年纪念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技术方面或者甚至是资金方面的危机，而是领导方面的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福特总统是一个被手下人牵着鼻子走的国家首脑，因而致力于继续行使美国“在战略上下降到劣势地位和使美国搞缓和的政策。”

作者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任何总统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坚决认为，这些错误至少是他个人的错误。”

施拉弗利小姐以在她的其它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同样严厉的言词谴责基辛格患有一种“投降并发症”。

她写道：

“只要我们有一个驾驭着制定美国总战略的易于投降的失败主义者，当然我们就不可能重建对我国的生存极为重要的战略威慑力量。”

她又说：“要是他能够继续用欺骗的办法

以说明他们自觉“气数”已尽，只有“天”可以救他们了。

冀东地震发生后，蒋帮在各方面都充分显示出其幸灾乐祸的心情。幸灾乐祸本身，就是一种最无耻最没有出息的表现；但蒋帮的心情并不只此，更重要的是，蒋帮感到，他们唯一的靠山美国的风声不好了，他们已经看出，今天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中美邦交的正常化势在必行。这形势使他们心惊胆怕，昼夜不安，忽然听到冀东地震，就如天降良机立刻大肆渲染，借此压惊壮胆。

今天蒋帮的处境是：对外，不论他们如何摇尾乞怜，美国要和中国建交，非要抛弃蒋帮不可；对内，不论蒋帮特务如何镇压控制，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伟大英雄的中国人民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冀东的地震算不了什么，逃到台湾去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更不堪一击。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同胞会满怀亲情伸出他们的双臂，迎接自己的骨肉兄弟到大陆上去，尽情的周游壮丽强大的祖国，参观更繁荣更美好的冀东地区。

——*+*+*——

最后通牒面前投降的军事劣势地位，那么这种背叛出卖行为不光危及我们的自由、生命和命运。西方的文明将被毁灭，世界各地的自由和宗教也将被毁灭。

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向全国全面披露，国会应当进行一次不受挑战的客观调查。回答基辛格是否说过这种有投降思想的话对我国的生存来说是重要的。两位作者认为，这件事在报纸上刊登的标题应比水门事件大，占的版面应比水门事件多得多。

书中说，“尽管水门事件威胁到我们曾经是神圣的荣誉，但是它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独立。”

书中有力地指出了这样一点，即不论是基辛格是否像指责的那样说过这些话，还是说过差不多的话，在过去八年中，美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丧失了战略力量是一个既成事实。

他们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基辛格这样做会不会是故意的。”

两位作者说，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报纸上刊登的二十几篇文章证实了基辛格的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并证明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他同基辛格的谈话的内容大概是可靠的。最有权威的一篇文章是基辛格在华盛顿的最亲密的朋友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

使总统和人民相信，我们并不需要新的战略力量，而且即使我们去生产这种力量也不可能及时得到，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希望生存下去。”

为了证实对基辛格的“投降并发症”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她引用了最近退役的海军作战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基辛格在一九七〇年对他说过

的话。朱姆沃尔特在他写的《在岗位上》这本书中，透露了他对同国务卿进行过的一些机密谈话的追述。

据说，基辛格曾经说过：“美国的全盛时期过去了，今天是苏联的全盛时期。我作为国务卿的任务是通过谈判争取到现在可以达到的、最容易被接受的二等级位。”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人民确实需要知道，对基辛格的这种指责是否确凿，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这种指责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有公开免除对他的这种指责的权利，即他故意使美国从具有压倒优势力量的地位下降到濒临于战略上投降的边缘。

但是，如果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即基辛格过去一直而且现在继续故意通过秘密谈判，取得一种会使美国在苏联